

新书掠影



作者爬梳史料，详细讲述了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的来龙去脉，探讨了婚姻暴力、亲属容隐、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李贞德 著
重庆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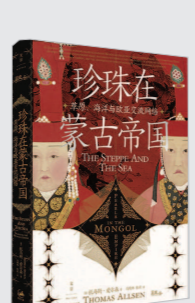
本书通过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两位洋顾问：德璀琳与汉纳根翁婿两人在华的特殊经历，呈现出在华外国侨民群体的整体状况，并分析其对中国现代化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与汉纳根》
张畅刘悦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作者真诚面对美国医患关系这一复杂问题，讲述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揭开医疗行业的沉疴弊病，从个体、制度和文化层面为整个系统开出药方，也为每个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指南。

《当医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
[美]丹妮尔·奥弗里 著
俞敏译
译林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本书以珍珠为主题，综合分析汉、蒙古、波斯和其他文字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全景式地展示了成吉思汗及后裔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元帝国国内的奢侈品生产、交流与消费。

《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
[美]托马斯·爱尔森 著
马晓林 张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东晋南朝时期，出身寒门或低等士族的“周旋人”在政治舞台上左右腾挪，成为这段短暂历史时期的绝佳注脚。本书通过对“周旋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登台与退场的叙述，再现了南朝社会结构急速变化调整的历史一幕。

《周旋变》
马陈兵 著
新星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从我们的“附近”出发，走向历史深处

池骋

如果说人类学家项飙关于“附近”的论述和提倡，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眼界(他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即是对此观点的集中展示)，那么，郑亚的《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乔争月的《阅读南京西路》和王唯铭的《蝶变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叙事》，则是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呈现了了解“附近”的可能性，以及“附近”的无限延展性。

关注“自己的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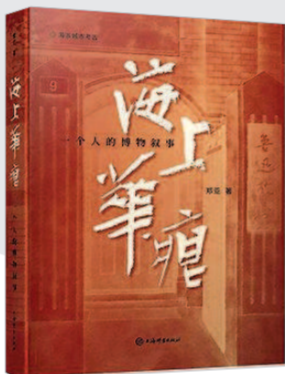
一位热爱植物的朋友曾经问我：你知道上海有多少种植物吗？哪些属于乡土植物，哪些又是外来的？我一时茫然。彼时我们正从福州路往上海博物馆走，他一路指点，不长的路程中竟然数出了十多种植物，并一一讲述它们的渊源与特性。我大受震撼，同时为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无知而感到愧疚。我也想起多年前去浙江衢州采访藤师程育春的经历。“打纸藤”是宣纸制作的重要环节，出身藤师世家的程育春当然深谙此道，真正令我惊讶的，是他对本乡本土的熟稔：举凡鸟树鱼虫，无不如数家珍，堪称一位博物学家。而且并非程育春如此，他的乡亲皆如此。和他们比，我纯属孤陋寡闻。

我的困惑在于，程育春安居的乡土拥有丰富的自然景物和农耕景观，人们浸淫其间，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关于周遭的知识体系；而我生活于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似乎缺乏这样的条件。但那位植物迷朋友给了我启迪——街道两旁的香樟、悬铃木，小区里的黄鼯狼、刺猬，还有野趣盎然的远郊，其实只要用心身边，我也能收获大量乡土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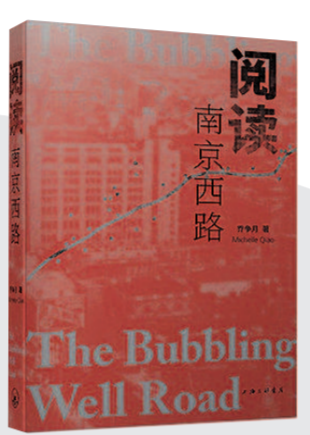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人类学家项飙的观点进一步拓宽了我的视野。在和非虚构作家吴琦的对话中，项飙反复提及要观察“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叙述清楚(见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项飙的代表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
郑亚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阅读南京西路》
乔争月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蝶变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叙事》
王唯铭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试。上世纪80年代，一群以浙江温州人为主体的商贩聚居到北京南苑地区，形成了“浙江村”。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项飙，利用同乡之便浸泡六年，以琐碎的方式记录浙江村日常，逐渐勾勒出这个小世界的各个面相。值得注意的是，《跨越边界的社区》语言平实，很少学术术语，贯彻了项飙“把事情说清楚”的原则。

我认为这一点之于城市人无比重要。像上海这种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超大都市，哪怕你生于斯长于斯，都难以在如此巨大的尺度上建立起认同感。因为大尺度空泛、不亲近，而人对某地的认同感，往往是以自身所活动的物理空

间(即附近)为圆点向外扩散的。没有对“附近”的认知和体会，人就很容易被打散成原子状态，成为飘荡于数字平台的无根游民。

从这个角度讲，了解“附近”既是建立城市认同感的起点，也是树立生活信念，追寻我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起点。“附近”的意义由此凸显。

从“附近”出发的资深文博人

郑亚新著《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就是一本探索“附近”的好书。全书分为“观博寻踪”和“读城阅市”两编，前者恰好是郑亚工作的“附近”，后者则从“附近”延伸出去，对城市进行“考古”。

郑亚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长期在上海文博系统工作，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因此，与文博有关的人、事、物，都能构成她的“附近”。在“观博寻踪”编中，郑亚从复旦文

博系小楼讲起。郑亚的忆述是细致而温情的。在底楼南侧的大教室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青铜器研究大家陈佩芬给他们上课，不苟言笑的陈先生将种类繁多的青铜器讲得一清二楚。她的口头禅是：“青铜器不要有劲哦！”底楼北侧的实验室则是上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课的地方，郑亚在文中写道，她曾上手过一件“拦腰断裂的兵马俑”和一尊“身首分离的唐三彩”，饶有趣味。楼下的小花园也是郑亚乐于盘桓的所在，从字里行间能看出，那婆娑的树枝、池塘里的倒影，至今令她魂牵梦绕。

从复旦200号文博系小楼出发，作为“文博人”的郑亚追溯了自己与上海诸多博物馆的交集，其中既有上海博物馆、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大咖”，亦不乏大学博物馆、女性主题博物馆等小而美的场所。而前往博物馆途中的名人故居，如大陆新村鲁迅故居、长乐邨茅子恺旧居、武康路巴金故居等，更是勾连出一条可供漫步的文旅线路。

进入“读城阅市”编，随着郑亚的触角不断延伸，她的“附近”由线扩成了面，申报馆、泥城桥、永平里、张园、豫园、人民公园……皆纳入视野。而郑亚的描述绝不仅仅停留于外部，而是带有浓郁的私人感情。例如，少女时代郑亚曾在永安公司购得一条漂亮的裙子，从那时起永安就成了她心目中的样板，往后数十年她只在这样的商铺里挑选服饰。

经年累月的走读，让郑亚记录下“附近”的演变。十多年前逛茂名路，她与沿街小店的阿姐讲闲话，在弄堂口围观新鲜迎娶上海女孩，去小餐馆吃辣酱面……此情此景已难再现，我们只能通过郑亚的记录追忆这份温情。

受郑亚启发，我也根据工作半径，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附近”。这一转有了新发现。原来我一直擦身而过的武定西路1375号，原先叫开纳公寓，开纳公寓不远处的愚园路江苏路口竖着一块名人故居指示图，新感觉派作家、文史学者施蛰存故居就在背后的弄堂里。从1938年搬到2003年逝世，他在这里住了65年。谁能想到，享誉世界的“北山楼”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这次收获激起了我进一步的兴趣，我开始关注更多与“附近”有关的书籍。《阅读南京西路》是一本适合边走边读的书。书不厚，作者乔争月的讲述却很细致，将33幢南西建筑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我以为本书最独到之处，是频繁征引老上海的英文报刊，如《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大陆报》等。这些珍贵的史料，一下子将老建筑拉回到当年的社会场域，赋予其鲜活的现场感。乔争月此前与人合著的《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上海郊区建筑地图》，也都是不错的“走读指南”。

走向历史深处的城市狩猎者

在“附近”兜兜转转的这段日子，让我又一次体认到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所蕴含的现代性特征。例如，无论鲁迅与施蛰存、茅盾、邵洵美、庐隐之间存在多少差异，他们都用

白话文写作，都栖居于弄堂，也都按照都市的节奏作息。他们事实上都被编织进了现代生活的网络，共享某些空间和知识。而如今，我也身处这张网络之中，这使我和他们具有了某种亲缘性，进而产生了深入了解的兴趣。换言之，我从“附近”出发，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区域，也走向了历史深处。

此时，案头的这本《蝶变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叙事》就显现出了价值。作者王唯铭，常年游走大街小巷，有“城市狩猎者”之称。20多年来，这位狩猎者出版了多部与上海有关的著作，尤其近几年，他的足迹以“附近”为原点越走越远，且表现出清晰的寻根意识。从2015年的《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到2017年《十个人的上海前夜》，再到最新的《蝶变上海》，王唯铭“全景式叙述”海派文化的雄心展露无疑。

在《蝶变上海》中，作者将海派文化分为上海意识、现代器物、生活方式三个层面，并逐次解析。所谓上海意识，指上海人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从对峙到和解再到融合，形成了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海派底色。如果说上海意识尚属于抽象范畴，那么现代器物就十分具象了，举凡电灯、自来水、照相馆、抽水马桶、汽车、电话、电影……正是这些新事物，让海派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是海派文化依托的土壤。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上海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如穿皮鞋、吃西餐、看电影、跳交际舞等等。

作者特别提及，1890年代至191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个人数大约在50万的新阶层(俗称市民阶层)，包括技术工人、小商贩、小业主、洋行职员、媒体记者、自由撰稿人等。他们是海派生活方式的核心人群，是现代器具的使用者和推广者，也是上海意识的承载者与传扬者。

如今，走在淮海中路、南京西路，走进焕新回归的张园，徜徉于作者用巴洛克式语言描绘的“十里洋场”，我仿佛能看到那些100多年前的身影。他们穿越纸墨，从历史深处款款而来。就这样，借助这些书籍，往昔与当下交织，我的“附近”也日益丰盈起来。

三味书屋



《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
郑重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20年前，我在写《海上收藏世家》时，其中有一篇写了叶恭绰，那时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大收藏家，所记的也仅是他的收藏生涯，没有能反映出他收藏高潮所处的那个北洋时代。在遗憾中却留下了“叶恭绰与北洋时代”这样一个题目，想了多年，真可谓“有此心，没有此胆”，一直不敢动笔。

所谓“北洋时代”，即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奕■、奕劻、翁同龢、李鸿章联名专折，奏议委任袁世凯训练新军，即小站练兵开始，中经1916年袁世凯称帝去世后的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北洋军阀也寿终正寝。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叶恭绰入邮传部，几经沉浮，1925年辞去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的职务，结束在北洋时代将近20年的宦海生涯。我想通过叶恭绰宦海沉浮的经历，应该能够看到北洋时代之一斑。

北洋时代是一个动乱时代，军阀割据，各方势力都想独霸中国，国家分裂，在“文统”和“武统”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发生了军阀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北洋

时代是最黑暗的年代，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我认为，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转型，北洋时代是这一历史转型期最激烈、社会变化最迅速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思潮、国粹保守主义思潮、改良派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民间团体党派组织此起彼伏，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类学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幼稚走向成熟。这样，诸多因素构成了北洋时代的特色：启蒙、思考、争鸣和觉醒。

在写作的生涯中，我比较欢喜写人物传记。因为人物传记是具体的，不只是他们的史料具体，而且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也是具体的，从人物的身上可以捕捉到历史细节。通过对几位人物的描绘，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处在北洋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与北洋时代相始终的叶恭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冒鹤亭曾说：“叶某的脑子大概像一个货仓，把各种物分类地存储，要用时一样样地取出。”叶恭绰的个性和思想是矛盾而相容的，他自己也说：“我一方面在讨论工业上技术问题，同时却可以谈谈宗教、哲学；一方面研究一个公司要怎样组织，同时又会想到音乐、书画上的问题。”又说：“对于一切的事情来到面前，从来没有忽略过丝毫，但从来没有带过丝毫。只是尽心竭力去做，到不得已的时候，我却会全盘割舍抛弃，一无留恋。”(《四十年求知的经过》)叶恭绰的学生、铁路桥梁专家茅以升，对他知之甚深，对他的评论是：“他不肯超越旧道德的范围来谋他个人的权位，他不肯轻试新潮流的武器来造他个人的势力。”(《退

庵尺牘·序》)这些都表明了从官僚到士绅，叶恭绰始终都是一位知识丰富、半新半旧的人物。叶恭绰有不少朋友劝他作自传，但由于他过于慎重与矜持，也有着正所谓“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故而未作。他个人认为：“我个人的历史虽复杂，还不及我的思想复杂得厉害，思想是说不尽的。”(《四十年求知的经过》)

20世纪40年代末，叶恭绰的学生俞诚之等编著《叶退庵先生年谱》，又经过叶氏亲自审阅，虽有为尊者讳，但它是一部材料翔实而可信的著作，后来更有几种叶恭绰年谱、叶恭绰研究等著作，有详有略，但都是以俞氏所著为依据。我在写此传记时，对叶氏的复杂经历删繁就简，避开许多事件枝节的叙述，而是从叶氏的札记闲文及叶氏朋友尺牘中，寻找他的思想。《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友朋尺牘》甚全，在该馆梁颖女士的相助之下，我对馆藏尺牘粗略地浏览了一遍；此后该馆编的《历史文献》又将其尺牘陆续刊载，为我提供了许多研读的机会。这些尺牘不只是叶恭绰，而是那一代人的情感、思想记录，我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可以作近代思想史而读之。所以，在撰写《叶恭绰传》时就想到有别于他作者所写的传记，而是以叶恭绰与朋友往来信札为主干，组成了本书的结构。

从立功来说，叶恭绰政事学术文章彪炳，功德甚多，其中最为重大者则以交通建设为上。中国近代交通肇始于清末而发展于民国之初，叶恭绰于此时期经历邮传部书记员及交通部次长、总长，又掌管交通建设，运思极精，所经历大事及艰辛难以计数，特别是收复铁

路主权、提出铁路之独立，不属任何一家军阀所独有。正是因为交通之便利使军阀割据的局面很快结束。叶恭绰自言他并不懂铁路建设，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些只有从他与他同僚、下属的通信中，才可看到他的“树人之不可缓、求才若渴、举贤如恐不及”的精神。古来的人立功多而不易立言，甚至功大的又多以文牘立言，言虽立而不传。叶恭绰与朋友往来的尺牘，使我们看到他在立功的同时又立言，这恐怕是在他的公文文牘中看不到的。就如同走进森林，不但看到主干，而且看到枝叶，避免了在人物传记写作时容易犯的“一叶障目”的错误。

风云激荡，叶恭绰时而在朝，时而在野，无论在朝或在野，他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对流沙坠简的保护与研究，似乎都和新兴文化运动的潮流有些相抵触，从他的文章诗词中也可看出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叶恭绰和新文化运动的推手蔡元培，相识于南北和谈时期，他们又都带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走向共和。从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共同合作，一脉相通。在整个文化发展史来看，张杨新文化和守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叶恭绰说他的经历复杂，远不如他的思想复杂。他所说的经历复杂也就是他在朝为官的那个阶段，时而在朝，时而被免职；时而复职，时而又被免职，需要他四面周旋，八方应酬，复杂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但他始终以传统道德与操守为底线，合则留，不合则去，进

退自如，毫不留恋官位。经历虽然复杂，思想不甚复杂。但是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与取向、宗教哲学信仰之探索、经济困境中的艰辛，以致到生命垂危之际以后事相托于朋友，经历比为官时要简单，但思想经历比为官时要复杂。对这个探索生命真谛的复杂心理，也只有从他与他众多朋友往来的信札中读得出来。探索叶恭绰对生命的态度及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正是我为他立传的目的，企图与其他作家写的传记有所不同。

叶恭绰是一位收藏家，如果说他的生活以收藏为轴，他的生命就是以这根轴为中心而转动。可以这样说，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他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云烟的历史人物。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以收藏为自娱自乐，而是以守护传承者的责任在肩，开展学术研究。这是有别于其他收藏家的。他对一些藏品的研究，可以持续多年，逐步深入地揭示藏品的内涵。从众多的题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认识的复杂性。以《凤池精舍图》卷而论，他把自己在苏州的居所名之曰“凤池精舍”，在请吴湖帆作图时，此图已荒芜。在吴湖帆作此图前三年的时间里，他曾数次致信吴湖帆作此图，图成后他并不是自己题跋，而且请众多好友题跋。他尤感不足，仍然念念不忘地作题。从题跋中，谈形与神、名与实之哲学。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他对故园的恋情，并看到他由此图展开去对吴中文化的研究。

北宋燕文贵的《山水卷》本是傅增湘的收藏，叶恭绰于1925年得之于傅增

湘或颜世清，是他的早期收藏之一。叶恭绰由此旁及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武夷山色图卷》等作品及几幅宋画，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这使我想到了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研究燕文贵仅存的四幅图及李成的《茂林远岫图》所进行的研究，并编著了《李成燕文贵合集》。

叶恭绰的研究和一般鉴定专家的研究有些不同。叶恭绰的藏品中有多幅佛像画，他把收藏和研究、信仰、人生融合在一起。叶恭绰收藏了不少僧人的作品及佛像，但他不信佛，不是佛门弟子，而是从佛学中寻找另一种精神世界。尘世给他带来许多烦恼，他想从佛学所提倡的精神世界求得寄托。

1968年8月6日，叶恭绰病逝，享年88岁。他爱交友，一生都在与朋友交友，即使是宦游生活19年，也没有远离朋友，而是文化界的布衣之交。正是因为他交友之广，所以才能留下数以千计的友朋信札。披览读之，感到其中闪烁的“和为贵”的精神。“和为贵”是中华文化之内核，历史早已证明即使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是以和为贵。斗则伤，斗则乱，斗则败，何况朋友之间？叶恭绰与朋友交友，洁身自持，求同存异，与许多人终生为友，不肯不弃。叶恭绰从青年到暮年都以白莲自喻。1934年去任顾颉刚，开凿白莲，亲手种下白莲；1958年吴湖帆又画白莲为他78岁寿日祝词，对花写照。从《五彩结同心》到《见心莲》，可以看到叶恭绰对民族、对社会、对朋友都是以肝胆相照。

整理旧稿，书香岁月，北洋官僚、收藏家，叶恭绰的一个个绅士的背影总是浮现在眼前。